

河湟『花儿』研究

HEHUANG HUAER YANJIU

马建华·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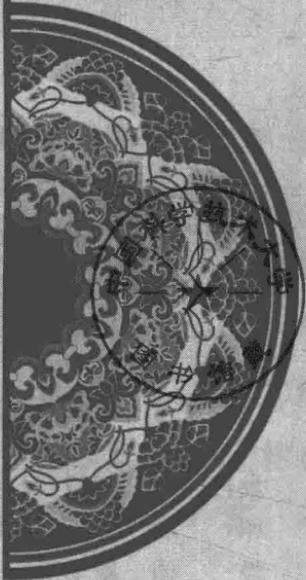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

赵宗福·主编
蒲生华·副主编

河湟『花儿』研究

HEHUANG HUAER YANJIU

马建华·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湟“花儿”研究 / 马建华编.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1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 / 赵宗福主编)

ISBN 978-7-225-05228-1

I. ①河… II. ①马… III. ①花儿(音乐) — 民族音乐研究 — 青海 IV. ①J6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9073 号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

赵宗福 主编

河湟“花儿”研究

马建华 编

出版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32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5 - 05228 - 1

定 价 299.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编委会

主任：赵宗福

副主任：马成俊 米海萍 文忠祥 唐仲山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文慧 马成俊 马建华 马岩芳

马都尕吉 文忠祥 刘大伟 邢海珍

米海萍 李卫青 李玉英 李言统

赵宗福 胡 芳 贺喜焱 耿英春

唐仲山 鄂崇荣 蒲生华 霍 福

前　　言

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长河中最宏大的巨流，也是民族文化中最坚实的根基。中国的民俗文化由于地域之广袤，民族之众多，地域民族特色多元多姿。青海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其地域特色十分鲜明，是建设青海文化名省的重要传统资源。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青海的民俗文化是青海乃至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是青海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民俗文化，‘非遗’保护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文化名省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新青海也离不开民俗文化。”（《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总序）因此，编辑出版一批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和前沿学术思想的民俗文化学书籍已是势在必行。于是，我们策划编选了这套《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

作为地域性文化的青海民俗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

力，深入调查研究各类民俗事象，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学术价值。几十年来，青海的民俗学者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睿智的思想创作了大量涉及青海民俗方方面面的优秀论文，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不少学者在民俗文化学中孜孜探索多年，个别的甚至数十年初心不改，其研究视野不仅涉及民俗学的各个领域，而且结出了丰硕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大多零星散见于国内外各种学术期刊。尤其是以往青海的民俗研究者人数少，而且零散，没有形成学术气候，远远落后于全国，更谈不上国际对话，以至于屡屡被其他专业的人所忽略甚至被歧视。直到 2012 年 5 月青海省民俗学会正式成立后，才打破了以往零散无依的民俗研究态势，学会汇集了全省最优秀的民俗学人才，形成了学历层次高、学术积淀厚的民俗研究队伍。当然，成立民俗学会的初衷就是意在集各自研究之所长，凝聚成多元相映的学术合力，建设一支精良的学术共同体，条件具备时集中展示团队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经过四年发展，青海省民俗学会取得了许许多多令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如申报获批青海省唯一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批承担各类国家基金项目 20 多项、承办 10 余次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包括出版发表了一大批以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为个性的论著。因此在 2014 年被评选为 AAA 级社会组织，2015 年度获青海省优秀学会，2016 年还被推荐为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这套十卷本近 300 万字的“论萃丛编”就应运而生了，实现了我们的部分共同心愿。

在社会转型时期，那些影响着广大民众的社会传统意识、文化积淀和生活习俗，将成为权力和政令之外的一种潜在力量，他将影响到转型社会的变革质量和发展速度。正是在此意义上，民俗文化

学作为一种专门研究大众行为模式、文化心理、社会习俗及其当下状态等方面问题的学科，将会发挥其重要的社会价值。这套丛书也试图集中体现青海高原传统民俗文化的特殊魅力和深邃内涵，并且期望在民俗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一些现实意义。同时也期望为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积累资料，拓展思路，从而更加形成聚力，戮力向前，更好地推进民俗文化研究的学术事业。

本丛书第一批共 10 册，内容以民俗文化学为主题，主要涉及理论与应用民俗、物质民俗、岁时民俗、礼仪民俗、信仰民俗、口承民俗、艺术民俗、西王母文化、河湟“花儿”和田野民俗等多个领域，主要收集学会成员研究成果中的精品。丛书由本人策划并组织编委会协商审定，具体编务委托蒲生华教授负责。同时为了给年轻学者提供锻炼平台，我们组织教授专家具体指导十位年轻学者分别负责各分册的编写工作，如马岩芳编《物质民俗研究》、耿英春编《礼仪民俗研究》、贺喜焱编《岁时民俗研究》、马文慧编《信仰民俗研究》、胡芳编《口承民俗研究》、邢海珍编《艺术民俗研究》、李玉英编《田野调查研究》、马建华编《河湟“花儿”研究》、刘大伟编《昆仑神话研究》、李卫青编《理论与应用民俗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顺遂心愿。可谓集学术团体之力，成学术共同体之绩。

丛书选文的遴选，主要遵循如下原则：1.作者必须是青海民俗学会会员；2.文章必须是在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过的优秀论文；3.研究对象必须是属于民俗文化学范畴；4.研究对象以青海民俗文化为主，同时兼顾国内外；5.以质取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学理性强；6.尽量照顾到各类民俗事象。由于每一分册容量小、专题性强

等原因，还有不少反映青海民俗文化的优秀论文未能收入丛书，在此深表歉意。

本丛书是中国民俗学会西王母文化研究基地和青海省民俗学会共同合作完成的，研究基地提供了鼎力支持，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涛先生等给予了关心指导。青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戴发旺先生以及各分册的责编和主编，还有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的蒲生华教授，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让我十分感动，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赵宗福

2016年9月10日

目 录

前言（赵宗福） / 1

花儿理论研究

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赵宗福） / 3

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

——以青海花儿为例（赵宗福） / 23

原型批评视域下“花儿”意象研究（阿进录） / 44

禁忌与狂欢

——浅谈“花儿”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功能（刘永红） / 60

城镇化背景中的花儿保护与“国家在场”（刘大伟） / 71

“在场”视阈下花儿的创作和表演刍议（李言统） / 82

鲍曼及其表演理论述评

——以河湟“花儿”的演唱为例 (刘大伟) / 98

“非遗”保护下花儿表演的实践调研

——以第三届大通老爷山花儿会为例 (李言统) / 111

花儿文本研究

民歌花儿的民间指涉和文本使用 (李言统) / 125

情感与欲望之间

——论“花儿”情歌的基本文化特征 (阿进录) / 136

个性的张扬 理性的扼杀

——谈“花儿”中的爱情悲剧 (毕艳君) / 152

“网络花儿”民俗主义评析 (王文业) / 159

花儿史研究

谈咏“花儿”的诗及其最早出现的年代 (赵宗福) / 171

中国花儿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赵宗福) / 180

论“花儿”的超断代发展 (毕艳君) / 195

青海花儿研究综述 (胡芳) / 203

花儿会调查与研究

青海四大花儿庙会的调查报告 (李言统) / 229

祓除与求子

——上巳节与花儿会之比较研究 (许四辈) / 254

论“花儿会”的狂欢化色彩 (阿进录) / 264

城镇化背景下的花儿会民俗主体研究 (许四辈) / 279

浅论花儿会的变异 (毕艳君) / 290

祈求生殖

——花儿会起源的再思考 (许四辈) / 297

关于花儿文化节的反思 (许四辈) / 308

花儿理论研究

HUAERLILUNYANJIU

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

赵宗福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其规模宏大的政府行为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尤其是与民间文化相关的诸学科似乎因势得宠，一大批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潮流中，成千上万的专业学者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遗产保护。诚然，大批专业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参与是功不可没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他们的参与策划、论证乃至主持把握，这项伟大的事业十有八九会搞得不伦不类，非但不能得到有效的抢救保护，反而有可能因非专业的行为使文化遗产的前景更加恶化。但是，相关学科的专业人员一窝蜂地都去做“宏观指导上的伟人”，靠着手头已有的资料，谈理念、做规划、发号召令、做指挥官，也未必是一件好事。笔者看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我们既

需要高层次、大手笔的指挥者，更需要大量的、有专业素养的具体工作者。也就是说，更多的专业学者需要在具体的非物质文化事项上深入实际，做一些扎实的田野工作和理论研究。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战略目标。基于如上思考，本文将以花儿目前的存活状态和与之相关的学术缺憾为个案，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专业学者的学术责任问题，以求表达本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观念。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下的花儿研究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大背景下，对花儿及其花儿会的调查研究也呈现出了很好的形势，不仅在花儿流行的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区的学者特别关注花儿的田野调查、编纂与研究，而且东部地区的学者也十分热衷花儿的田野调查和文本研究，甚至美国、日本等国外的学者也来到西北研究花儿。半个世纪以来，还形成了花儿研究的三次高潮，即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花儿源流的讨论，改革开放后对花儿的全面研究，近年来用新理论、新方法提升花儿的学术研究层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批博士生、硕士生参与到花儿田野研究的队伍中，因其独特的专业性和崭新的理论视角，其成果更显得卓而不群。^[1]与此同时，一批对花儿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程。这是可喜可贺的。花儿为何在众多民歌中受到如此重视？因为花儿作为多民族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部民歌乃至中国民歌中属于标志性的口承文艺，是最富有艺术欣赏价值、学术研究价值的民歌。关于其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1. 多民族共同用汉语演唱花儿，体现出民族亲和、兼容共存的

精神。花儿流行于中国西部6省区和9个民族中间，地域之广，民族之多，在中外民歌中是极为罕见的。特别是这9个民族中，既有信仰儒释道的汉族，又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土族、蒙古族、裕固族，还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大部分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其中藏族、蒙古族还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民族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也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共同用汉语演唱花儿，体现出了一种民族亲和、兼容共存的内在精神。这种内在精神在甘青地区体现得尤为突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民歌像花儿这样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被9个民族所共同拥有，所共同喜爱。例如信天游主要流行于陕北地区的汉族中间，即使把它和蒙汉调视为一种民歌的不同流派，也只是流行在陕北、山西和内蒙古南部的汉族和蒙古族中间。至于许多少数民族中的民歌往往只在本民族中流行。

2. 独特的民歌形式表现出民间口承文化具有无穷魅力。花儿，特别是流行于青海地区的河湟花儿，不但从歌词的结构、韵律等方面体现出极强的口头程式，而且形成了在中外民歌中罕见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如歌词的整体结构是典型的“扇面对”（即使歌词句子拓展到十几句，也概莫例外），单双句遥遥相对应；单句单字节奏结尾，双句双字节奏结尾；押韵形式上除一般民歌采用的通韵方式外，经常采用交叉押韵的方式，而且单句押平声，双句押仄声；同时不论单句还是双句，都常常押重韵。这些奇特的格式韵律除了在《诗经·国风》中见到外，在世界上任何民歌中都找不出可以相媲美的。这使花儿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也显示出了其在中外民间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3. 丰富的音乐曲调表现出多民族音乐交融却又保持各自特色的

民间艺术价值。花儿的曲调丰富多彩，90年代搜集到的有100余种，目前已经丰富到200个曲令。它们虽然以高亢悠扬为主，但也不乏轻松愉快或委婉细腻的曲令。根据专家研究，这些曲调有些是直接继承了中原宋元文化，有些则是在河湟地区多民族音乐文化的土壤上新生的。所以，这些曲调都有着自己的旋律特点和音乐特色，但是由不同的民族歌手唱出来则又有其本民族的特色，同时不同的民族往往擅长于某些曲调，如土族的《梁梁上浪来令》《绿绿儿山令》《杨柳姐令》撒拉族的《撒拉令》《清水令》《孟达令》；回族的《马营令》《河州令》《川口令》；汉族的则如《尕马儿令》《水红花令》《白牡丹令》，等等。这些具有异质文化意味的音乐现象，对研究多民族民间音乐的相互交融和衍生、再生状况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大力发展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4. 包罗万象的内容表现出丰富的文化蕴藏及其研究价值。花儿来自各民族活态的日常生活生产，多民族丰富的生活现实决定了花儿内容的丰富性。花儿以情歌为主，生动地表达了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乃至不同个体的复杂情感，对研究民族社会心理、民众情感模式有直接的参考价值。花儿的比兴句涉及的民众知识更是无所不包，据有的学者概括，大致上可分为60个方面，称之为地方性知识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另外，花儿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民歌，语言上主要使用河湟方言，同时也夹杂了大量的藏语、土语、撒拉语等民族语言词汇。当地民众把这种使用多民族语言的花儿叫做“风搅雪花儿”。这些对研究方言和民族语言以及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融也是难得的材料。

5. 众多庞大的花儿会表现出的民俗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价值。青海东部以及甘肃的一些地方有数十场具有悠久传承历史的花儿

会，一般都有数万人参加，多的可达到二三十万人。参加者包括各地各民族群众，届时云集一处，对歌数日。如果把各地的花儿会联结起来，足足有五个月时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诗与歌的狂欢节”^[2]。这样庞大的文化空间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它的民俗文化学学术价值以及文化旅游价值不说自明。正是这些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确定了花儿是西部民歌的标志性口头文艺精品。当然，从实际影响看，陕北信天游在国内外的影响要比花儿大一些，特别是在官方演出文艺中，信天游简直就是中国民歌的代表，这与陕北是革命圣地和文艺的政治化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从纯学术的角度比较，两种民歌各有千秋，但花儿的实际内涵更为丰富。但是，如此美妙瑰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却处在濒危的状态。花儿是“张口就来，闭口即无”的口头文艺，而花儿会则是民间自发进行的以演唱花儿为主的歌节。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其脆弱的生态环境遭遇了无法回避的空前困境。部分古老的花儿由于抢救不及而消失，有影响的歌手多年事已高，年轻人又忙于外出打工挣钱，倾心新潮文化，不再热心花儿的系统传承，民间文艺后继乏人，传承链条已残缺不全。花儿会的空间日趋狭小，规模也日趋式微。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影响面大的花儿会有逐渐冷落甚至停顿的趋向。而一些走了样的“洋”花儿正在以其强势的传媒手段逐渐成为主流，由城镇向乡村浸染，大有取代传统的原生态花儿的趋势。固然，花儿以再生态甚至新生态的形式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得到年轻人们的认同，并非完全是坏事，但也绝不完全是好事，长此以往，传统的花儿及其花儿会将不复存在，我们再也听不到原汁原味的花儿，看不到民俗意义上的花儿会了。

花儿的这种存活状态，引起了民间文化工作者和政府的重视。